

为他准备的谋杀

我去年十一月特别想杀人，因为懦弱迟迟没有动手

蒋峰 作品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

为他准备的谋杀

蒋峰 作品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他准备的谋杀 / 蒋峰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1.3

ISBN 978-7-5086-2486-0

I. 为… II. 蒋… III. 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3367 号

为他准备的谋杀

WEITA ZHUNBEI DE MOUSHA

著 者: 蒋 峰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 张: 17 字 数: 17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2486-0/I·163

定 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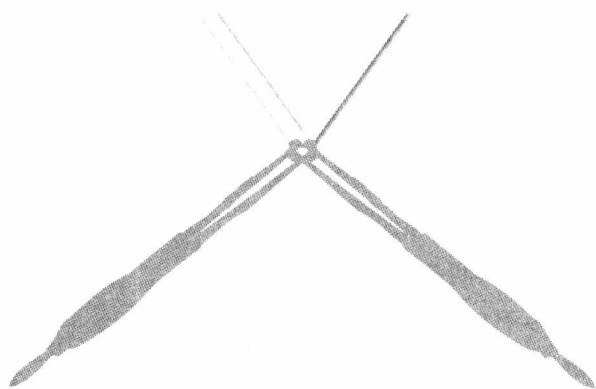
author@citicpub.com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283
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第1章

[在谋杀]



我去年十一月特别想杀人，因为懦弱迟迟没有动手。三个星期之后，一次意外让我摘掉警徽，下了枪，杀人计划不得不延迟。那个人活得比我还好。

我没做错任何事，星期三夜里十一点十四分是我执勤的时间，行至尚志大街路口，还有三十四秒的红灯，三十秒、二十九秒、二十八秒……我叼住一支烟准备掏打火机的时候，有人差点儿把我撞死在车里。

一辆捷达在绿灯来临前对我追了尾，他喝了不少酒，感觉像刚从酒缸里洗完澡出来。事情本应很简单，我也做过交警，测一下肇事者的酒精含量，每一百毫升超过二十毫克就扔进拘留所，要是超过八十毫克酒精，就得让他到监狱体验两年了。因为被追尾的是警车，现场需要稽查协查。我下车坐到马路边无精打采地看着他们忙，点不上烟，火机在车里爆掉了。计划搞砸，我很累，那段时间并不顺，各种烦心事，东想西想我睡了一会儿。

车拖走后过来一个稽查，自我介绍说叫高文，说了一堆“都是同行，相互理解”的场面话。我看着他，没应声。他问了我几个程序问题，我说我八点值班，到第二天凌晨三点，这时间出来透口气。他开始警觉，要我再说一遍。我没回答他，只是盯着他。他俯下身，问我的警号是多少。不用告诉他，他带着资料来的，欧阳楠，警号 65707。他像条狗一样在我

面前闻了闻，握紧拳头振奋一下自己，指着后车的醉鬼说：“你喝的比他还多！”

稽查喜欢揪警察，一般的罪抓路人没油水，可如果是我们，但凡酒驾，马上扒皮，永久离职，为了铁饭碗，没办法，不惜一切也要疏通关系。他递给我一张名片，高君，国华汽修厂总经理。

“这人是谁？”我接过来。

他举食指在我面前晃晃，说：“我保证明天就让你扒皮，以后有困难的话，给这儿打电话。”

他拍拍衣摆，站起来，照着警官证抄下我的姓名、分局，转身让两个稽查带我去测试。我对那一天的印象到此为止。

第二天我应该轮休，昨晚怎么进家门的我都想不起来了。我宿醉未醒，张队的几个电话我都没接。十点钟他带着稽查高文敲开我房门。开门时我呢子大衣里面只穿了条平角短裤。张队解释本来想通知我的，打过我电话。我翻开手机看看，四个他的未接来电。我笑着说，你随时可以来，然后指着高文讲：“可是这位好像就不方便了。”

高文丝毫没被影响，站在门外出示证件问我是不是欧阳楠。我挡在门前瞪他，说我们昨天不是见过了吗？他点点头，在楼道里跺跺脚。张队摇摇头，让我先开门，放他们进来。

他们在沙发上坐下，我去换身衣服再回来时，高文已经打开笔记本，问我：“你们家几口人？”

“四个。”

“家庭成员？”

“忘了。”我侧身对张队说，“你饿吗？我去弄点儿吃的。”

“能看一下户口本吗？”

张队挠挠头发，劝我：“配合一下吧。”

我看看张队，又打量着高文。他与我对视，我也不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一个恳求的眼神？不可能。我低头苦笑说，我找找看。我记着户口本被我妈放进阁楼哪个箱子里了。我做警察后就再没人来我家查过户口，上次用

这个还是我和我老婆领证的时候，一年半以前。

翻到后我从楼梯上扔给高文，他接过来吹吹户口本上的灰，打开翻看，向我核对：“王天明是谁？”

“户主。”我回答他。

“上面有写，我问你他是谁。”

“我母亲的丈夫！可以了吧？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他说，“你们不是一个姓，我没反应过来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也没随我姓。”

我能感觉到张队在偷笑。

高文抬头盯着我说：“我希望你严肃点儿。你的生父状况如何？”

“不知道，好长时间没给我托梦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

“我说，”我有点儿生气了，“谁给你的权利，让你问东问西的？”

“纳税人，你的薪水是人民给你的，我有权过问你。”

“真你妈扯淡！”

“家人在家吗？”

“不在，出去玩了。长白山，延吉，他们三个开车去的。”

“你怎么没去？”

“我要上班，这还用问吗？”

他没作反应，问有烟灰缸吗。我说没有。他想想，把烟塞回烟盒。我却给张队一支烟，让他随便弹烟灰。“你有七天年假。”高文打开我的档案，“你完全可以一起去。”

“我不想去，行吗？”我自己也点上一支烟，“打听这个有意思吗？”

“没意思，”他说，“我的工作。”

我笑了，我不怪他，他的职责就是站在警察的对立面，也就是一份糊口的工作。算了，都不容易，我尽量配合他：“我和我老婆闹离婚，俩老人不希望我们离，就带她出去玩了，也让我静一静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不知道，说是我同意不离婚，他们才肯回来。”

“所以你就在值班期间酗酒？”

“就昨天一回。”

“喝了多少？”

“一斤，不到两斤，加上五瓶啤酒。”

“酒量够大的，和谁喝的？”

“自己，老板打烊后陪我喝了点儿。”

“你经常在工作时间内酗酒吗？”

“就昨天一回！”

“走个程序，请把你的枪和子弹交出来。”

“这不是走程序的事。”

“好，我就是要下你的枪！可以吗？”

“枪还在，子弹被我妈收走了。”

他审视着我，“被你妈收走了？”

“是收了，她怕我杀人。”

他眯着眼睛看我：“你想杀谁？”

“你不需要知道。”

“我有权调查你。”

“我也在警校读了四年，和你一样的学历。”我要些许反抗了，“杀人犯法，随便想想，想什么都不犯法。”

他使用对讲机，原来楼下还有一伙人。他们上来翻查屋里的每一个角落。高文与我互相盯着不说话，一刻钟后他们空手归来，对他摇摇头。他合上笔记本，抬头问我，“那么，你和你老婆离婚的原因是什么？”

“我们还没离呢。”

“你们要离婚的原因是什么？”

“我操你妈！”

我明白，就算我不骂他，我也当不了警察了。我的罪名是在岗时酗酒和酒后驾车，尤其是，开的还是警车。张队保我，我没上警员法庭，然而一轮又一轮的谈话，局长往下起码十五个领导，一个一个单聊，审嫌疑人也就这个程度了。

内部处理，即日起欧阳楠同志撤销一切职务。一切，可我就他妈一个职务！

我摘掉警徽，脱掉警服，他们还跟我要夏装。我把家翻了个遍，也没见着子弹，我把找到的物件连同枪一起还回去。这枪我只开过两次，打死过一个人。那回也是张队争取，将“击中后当场毙命”改为“击中后歹徒继续逃跑，因流血过多而亡”。

星期天我去局里收拾了一下东西，那天人少，其实就我一个。之后我在家睡了三天，每次醒来都是在洗脸刷牙时才想起来，我已经被扒皮了。我要重新考虑婚姻问题和杀人计划。我要以无业的角度再想想，谁会跟我过下半辈子。

星期三，我和张队吃了个饭，他告诉我现在只是停职，他相信我有机会立功再回来。我说我他妈不干这行了，立个屁功！去公交车抓小偷？还是去火车站找票贩子？回到家里我才想，我不该发这种小脾气，我奔

着道歉去的，几年前就是他把我从交警调到他的支队做刑警。我却做成这个样子。

星期四，我整理钱包，找出名片，给那个汽修经理打电话，我以为会有一份新工作。那边沙哑地回应，像是马龙·白兰度的教父。我以前看《教父》就老在怀疑，这嗓子是不是被砂纸磨过？我学了两个月都学不像。他问我警员编号。

“我已经不是警察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找我的都不是了。”

我告诉了他，警号 65707。也许这五个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“酒驾和离岗？”他问。

“你知道的真多。”

“我帮你复职。”

“你只是个汽配经理。”我提醒他。

“你不用管，酒驾十万，在岗酗酒二十万，一共三十万帮你复职。”

我左手握电话，右手把玩着他的名片，高君。我明白怎么回事了：“你是高文的哥哥还是弟弟？”

“你不用管。”

“我得管，因为上次我把你哥的妈操过了，很可能也是你妈。我今天告诉你，很恶心。”

他应该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，比他哥耐心多了，没发脾气，没挂电话，说：“筹到钱联系我，上面写你今年二十七岁，还年轻，不然就在商场银行当一辈子保安吧。”

保安感觉也会恶心，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五点站在银行门口，有客户进来还要介绍——如果你取钱，请到左边的自动提款机；如果你开户，请填写绿色的表格；如果你买基金，请直接在里面的基金通道办理；如果你抢劫呢，我没有枪，只有一个电量不足的电棍。那么，请便。

我家人不在，我搜罗出我能找到的存款，十三万多，不够，而且没有一

分钱是我攒下的。我吃着方便面把这些数字加了一遍，把存折又放回原位。

我妈依然三天联系我一回，有时候王总也说两句。我就不让我老婆跟我说话。长白山布满白雪，雾凇很美，仿佛香草冰激凌抹在枝头散发着香味。

“你真该一起来。”我妈说。

“你多拍些照片给我。”

“局里忙吗？”

“忙，特别忙。”

“现在回来合适吗？”我妈试探地问，“丹丹她想你。”

“我不想她。”我说，“我也想你和王总了。”

有几次我差点儿脱口而出我停职的事，都阴差阳错地岔过去了。但我还是讲出了这句话——我又恨她，又想她。我没跟我老婆通过一句话。

有一次夜里我终于睡不着了，那是我离职后的第十天。我吃安眠药，三五片都不管用。我想起那些烂小说，诋毁刑侦的推理故事，都是给几片药就置人于死地的情节。纯扯淡，半瓶吃下去连打个哈欠都费劲。我想每个人，想念每个对我好的人，我觉得我快要死了。我给我妈打电话，凌晨三点钟，没接。三点半她回给我，我说：“妈，你回来吧，我想你了。”

“丹丹也醒了。”我妈说，“她在看着我。”

“让她也回来。”我原谅她了，我把话筒贴在脸上，一时有点儿哽咽，说，“我也想她。”

我生了场病，发高烧，我以为病好之前能看见家人，结果是自愈的。十二月初张队来看我，说必须请我吃个晚饭，去个贵点儿的地方。我选了大连海鲜，待业半个月，我都有点儿仇富心理了。

他让我点餐，我不点太贵的，可也绝不挑贱的。合上菜单我审视他：“你干吗请我吃饭？”

“我没保下来你，该还你的。”

“你已经很好了，这是我的事。”

离职的话题我们都没兴趣往下聊。我低头掰筷子，这是我的爱好，在外面吃饭，或难过，或高兴，我都不自觉地把筷盒里的筷子掰断。待桌上大概攒了二十多段时，张队问我家人回来了没。

“快了，路上了。”

“听说那边下雪了。”

“我以为长白山一年都下雪，长白嘛。”

他递我双新筷子，说：“我上次才知道，原来你有个继父。”

“王总？我不记事的年纪就跟他，要不是俩姓，我能以为他是我亲爹。”

“他在开公司？”他问。

“谁？”

“王总。”

“没有，他就是一工人。我大了不肯叫爸，直呼其名也不像话。他想的，叫他王总，不尴尬也不失礼。”

“他对你不错？”

“凭良心讲，是不错。他没儿子，就把我当儿子养。后来他女儿也叫他王总。”

“不是你妹妹？”

“不是，他和他前妻的，比我小一岁。”我顿了一下，说，“我们俩没有血缘关系。”

“她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不说这个了吧，说出来你会乐的。”

“哦？那你亲爹呢？”他问，“真的没了？”

“我印象不深，他带着我哥哥走的。”

“你还有哥？”

“我跟我妈留在哈尔滨，我那个姓欧阳的父亲带我哥去的云南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好打听？”我把碎筷子拢成一堆儿。服务员陆续上海鲜，我拽只螃蟹揭盖儿，问他最近怎么样。

“还行，就是轮我一脏活儿。”

那是我们在一部电影里看到的词，把警察通知死者家属的过程叫“脏活儿”。后来我们就沿用，谁都不愿目睹死者家属各种各样的不可接受的痛苦，“脏活儿”都让新警察干。然后我们会轮流请他吃饭。我也干过十多次“脏活儿”。

“干吗让你干？”我问，“什么案子？”

“新来的干不明白。雪崩，一家人都死了。”

“别唬我，咱这儿还没下雪呢。”

我低头吃蟹，碰上一有黄儿的。服务员端盘炒螺肉，我让她拿几双筷子，筷盒空了。她瞅着桌上的碎筷子，貌似很有意见。我让她快去。她哼

哼两声，走了。

“是山，”张队拿个贝壳在筷子堆下绕一圈，“这家人开车往下盘，正好一团雪从山上滚下来，砸向这辆车。”

“哈尔滨哪儿有雪啊？”

他静了有半分钟，足令我预感到噩耗的时限。接着他在椅子上坐直，松松他的警服领带，一字一句地说——长白山。他又沉默了一会儿，那沉默让我一时什么都问不出来，他说：“他们都在里面，都死了。”

“你开玩笑？”我连螃蟹都抓不住了，牙齿直打战。我感觉自己只能呼气，无法吸气，耳朵嗡嗡地响，饭店碗碟的声音如警笛声在脑子里震荡。我听见自己问：“在回来的路上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让他们回来的。我本来秋天就该让他们回来的，我干吗非得拖到冬天下雪？”

“这不能怪你。”

张队说去洗手间，他有意让出空间给我。我看着他的背影大声哭出来。邻桌的人转身看我，服务生几次过来，都被我一摆手赶走了。张队拎了两瓶白酒回来，问我继续在这儿喝，还是换地方。

“就这儿吧。”我挤点儿笑容给他，“换地儿还得再哭一次。”

“还有一件事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也许你早知道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那边报告说，你老婆有身孕。”

我这回没说话，低头吃虾。张队有点儿拘谨，过了一会儿，要跟我碰一杯。二两杯我一口干掉，嘴里有点儿辣。我说：“那个稽查，高文，问我为什么想离婚。记得吧？”

“他是傻逼。”

“我离婚，酗酒，被开除，是因为——”我心跳得厉害，感觉端着酒杯的手都是抖的，我使劲儿把后半句说完，“那孩子不是我的。”

“谁的？”他张着嘴，抑制不住惊讶，“算了，我也傻逼了。”

那天我们喝到凌晨两点，张队的目的很简单，陪我喝倒，让我直接入睡，也用不着多想了。可是他比我先躺下，挤进出租车，竟是我把他送回家的。下车时下雪了，我冷得打哆嗦，才想起皮夹克忘在车里了。这两年哈尔滨不常下雪，去年就这一场大雪，厚得能埋人。我拽着他，在雪上拖出一条壕沟。回望了一眼，我就走不动了。我放下他，趴在雪地上又一次哭了出来。

他家楼道没灯，十几把钥匙我试得直哆嗦。推他上床后，我翻衣柜找了件大衣套上。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对着池子干呕了半天没吐出来。回卧室他早打起了呼噜。我系好扣子下楼，想起他家门没锁。我把他摇醒，让他在里面锁上。他耷拉着脑袋送到门口，才反应过来，执意要我在他家过夜。

“你清醒吗？”我问。

“去我房里睡觉！”

“我今晚跟你说的事情，你明天还能记住吗？”

“你，在这儿睡！”他说，“我去前妻家睡。”

“得了吧。”我说，“帮我查查他们三个，都有什么保险，再找个擅长遗产官司的律师。”

“跟谁争遗产？”

“欧阳桐，我亲哥，查查他有什么非法勾当，帮我把他送进去。”

“哈哈，”他大笑，“搞定！”

“把他关起来，是在救他，不然我会杀了他。”

“收到！”

“我认真的。”我对他耳语道，“我老婆的孩子，是我哥的。”

除了我妈和我老婆，延边那边过了一个星期都没找到王总的遗体。长白山一直是个姓金的和我联络，听声音不够老练，估计大学刚毕业。他自我介绍过是哪个部门的，我也没记住。那边的旅游局有专门处理后事的部门吗？长白山翻车很多吗？他差不多一天打一次电话对我说明进展。汽车找到了，里面是两个女人，但还没有找到王总，驾驶位是空的。按照他们部门的分析，王总在翻车的刹那，打开车门跳了出去。

我没听进去，有点儿走神，我想，是在车里闷死好，还是脑袋撞在岩石上好一点儿？哪种都很痛苦，想到王总的脑浆被爆开，或是我妈和丹丹在车里渐渐喘不上气的情景，我有点儿恶心。可他还在继续说，我也没理睬他讲什么。他还年轻稚嫩，还在按照工作流程办事，对我宣读他们的责任及义务。我听烦了，打断他：“把遗体运过来。”

“对，我就是在跟你解释，你继父的遗体不好找。”他说，“我们这儿常年积雪，挖一辆车好搞，要是从山腰的白雪深处搜出一具尸体有点儿费劲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麻烦？绕着车找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山是分层的，”他怕我不明白，接着解释，“从上面往下跳，不一定掉到哪一层，就是最深摔到大峡谷的湖里，也有可能。”